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外交

——基于国际战略的视角

宫力

摘 要: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中国外交在邓小平的战略指导下,结束了外交结盟(或准结盟)的历史,实行“不结盟”,推进全方位和平外交,为“独立自主”增添了新内涵;邓小平在外交决策中提升对于经济因素的考量,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创办特区吸引外资和技术,促成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良好互动;邓小平沉着应对严峻国际局势,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使中国外交走出低谷,迎来新的转机。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外交;历史经验

DOI:10.14130/j.cnki.mzr.2024.04.002

1978年12月,在邓小平倡导下,基于对总体国际局势的准确分析和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①,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对当代中国外交基本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邓小平重新审视时代主题,全面调整对外战略,在一系列重大外交问题上提出新的思路和新的论断,体现

出杰出战略家的宏大格局和远见卓识,并在开拓当代中国外交新局面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邓小平外交思想,从而使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精准判断时代主题,首次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全面改变了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

从国际战略的视角来看,对时代主题的

作者简介:宫力,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页。

认知和判断,对于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根据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对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国际安全问题,特别是世界大战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观察和思考,逐步形成了新的看法和新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战略态势,与70年代相比已发生较大改变,苏联霸权主义扩张受阻,苏攻美守的态势转换为美苏互有攻守,总的国际局势已有所缓和,各方呈现出谈判对话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上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和平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和制止战争威胁的力量和因素有了较大的增长,中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已有较大改善。

根据这种情况,邓小平经过慎重思考,改变了多年以来认为国际安全形势是“‘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①。他在1983年3月2日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②由此对中国过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主流看法作出了修正。

1984年11月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使节基金会主席阿姆斯特朗。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他进一步指出,现在“小仗一直在打,但无关大局。和平因素不断增长,和平是有希望的”^③。基于这样的逻辑和判断,中国要做的事,就应当是专心致志“搞现代化建设”。

在缜密调研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重点阐述了和平力量增长已经超过战争力量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等观点。他深刻指出:“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④这个结论,既有理论分析

①《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3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页。

作引领,又有充分的事实作论据,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邓小平还明确把西欧和东欧看作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1985年9月14日,他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我们现在观察国际战略形势,不仅把中国看作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而且把西欧和东欧也视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制约战争的最大力量是第三世界,这些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有这么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存在,尽管仍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如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本世纪战争打不起来,下个世纪和平就更有希望。”^①

邓小平关于在20世纪大的战争打不起来,21世纪和平更有希望的战略观点,成为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经济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中国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创造了有利条件。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根据新的国际发展趋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新论断,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有了新认识。这一点至关重要。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理解是战争与革命,即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在这种认知下,“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②。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时代主题的阐述从“战争与革命”调整到“和平与发展”是根本性的转折,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全面改变了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并且成为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这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③

此后,邓小平进一步把和平与发展提到全球和战略的高度,并且顺势提出了以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合作的问题。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明确提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④。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的观点。他说:“现在世界

①《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页。

③《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①

邓小平还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华期间,敦促联合国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1987年5月11日,他在会见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②

党的十三大将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些科学的论断构成中国共产党从最高战略层次上洞察全球发展趋势和制定更加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的主要依据,并且对当代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和平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有利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广交朋友,全方位地开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强调“东西南北”四个字,发展是核心、是关键。由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当作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国民经济总产值快速提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全面增强。此外,中国在国际上努力沟通南北关系,积极促进南南合作蓬勃发展,取得巨大成效。中国发展得越好,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就越有保障,因为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和平和发展力量的增长。邓小平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③

二、改变“一条线”的战略,终结中国外交结盟的历史,率先退出冷战,不结盟、不打牌,突显中国独立自主的战略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两极格局背景下,为了维护新生的政权,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实行“一边倒”的战略,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并不是完全倒向苏联(是大的战略上的联合,而战术上不是没有批评)。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后,力不从心,决定进行战略收缩,而苏联霸权主义却咄咄逼人,对中国的威胁超过了美国。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④。因而中国实行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战略,共同反对苏联扩张。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和中国面临的安全风险明显降低,国际环境和周边安全形势已有很大改善,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持续提升,已有足够的能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邓小平考虑到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分量较重,如果站在美国和苏联任何一边,都会使国际战略格局失去平衡,导致国际局势动荡和不稳。因此,从大处着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②《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④《毛泽东年谱》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42页。

眼,更新外交观念,适时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已是势在必行。

在邓小平的战略指导下,我国当机立断,改变“一条线”的联美抗苏战略,毅然决然地结束了中国外交结盟(或准结盟)的历史,坚定实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①,同时进一步增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由此展开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政策,加强和巩固了我们作为独树一帜的战略力量的国际地位,把握住了历史的主动权。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向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阐明:“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②根据邓小平的相关指示精神,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在第二天会见德奎利亚尔时更加直白地指出:“中国不会依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③中国外交的这些重要变化是为了维护国际局势的稳定,是为了维持世界战略力量之间的平衡。

邓小平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举措,在1982年9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正式确认。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

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④独立自主是贯穿当代中国外交的一条红线,但与过去相比,党的十二大强调的独立自主增加了一个新的内涵,那就是“不结盟”。邓小平还代表党中央提出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的三大任务:“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⑤邓小平强调“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⑥。因此,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突出这一点至关重要。

党的十二大关于外交政策的新表述充分说明,为适应新时期的新情况,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为“独立自主”增添的“不结盟”新内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从此之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中国率先退出冷战,不参加任何国家集团,也不再同任何国家结盟。具体说来,如何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成为关键。一方面,对于美国,中国有意拉开距离,不再形成一种准结盟的关系去对抗苏联。中美关系要沿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方向正常发展,同时充分吸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对于苏联,中国也适当调整政策和策略,尽量避免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③《黄华欢宴联合国秘书长一行》,《人民日报》1982年8月21日。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发生大的冲突,导致关系过分紧张。同时,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即要求苏联消除对华关系三大障碍^①),积极争取缓和甚至改善两国关系。这也是关于维持国际战略力量之间平衡的考虑。

党的十二大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方略,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关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由于中国退出冷战,不再以美或以苏划线,大大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增强了自身的国际地位,这样一来,“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②。

此后,邓小平在多次会见外宾时阐述和宣传中国外交新战略。如1984年5月,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再次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③中国对外关系由此呈现出新的气象、新的布局,即在维持国际战略力量平衡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尽快发展壮大自己。

邓小平在1985年6月4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对这次意义非凡的对外战略调整及其重大历史意义作了深刻总结。他说:“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

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④他认为:“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⑤从这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外交新战略的指引下,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三、在外交决策中提升经济因素的考量,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创办特区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促成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良好互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开始重提“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谓“箭在弦上”。因此,在外交决策上,对

^①即要求苏联从蒙古和中苏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③《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28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于经济因素的考量大幅提升。邓小平强调,中国优先同已建交的国家发展贸易,并与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签订了贸易协定。这样不仅促进了对外贸易大幅增长,而且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美国如再不行动,就有可能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

中国利用巨大市场吸引西方的举措开始见效。美国希望通过中美关系正常化来推动两国经济贸易发展。在中美第一回合谈判结束后,1978年9月19日,美国总统卡特利用中国新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向他递交国书之机,表达了美国希望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愿。在此前后,为了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友好姿态,卡特下令采取措施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并转告其盟国,他们是否愿意销售军事装备给中国由他们自己决定。至此,中美双方立场有所接近。

邓小平仔细分析了中美谈判进展情况,决定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11月2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四个月以来,黄华(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同伍德科克(美方谈判代表)商谈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情况,以及9月19日卡特、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先后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时的谈话情况,邓小平提出:“看来美方想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外交部先把对方的具体想法搞清楚,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①

1978年12月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筹备期间,在邓小平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考虑的重大问题中,第一条就是要实现与美国建交。为了统一党内思想认识,他向党内说明中美建交“这确实是个大局”^②。由于美国在中国对外开放大棋局中的分量举足轻重,我们应有大局观念。

如果说1972年中美是为了共同应对苏联威胁走到了一起,那么到了1978年,经济因素则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学习借鉴美国先进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离不开中国巨大市场潜力和投资回报。中美在经济上的高度互补和相互需求,成为支撑中美关系新的战略支点。1979年7月,中美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贸易关系协定》,并于1980年2月正式生效,推动了中美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美国成为中国吸引外资、先进技术和人才的重要对象。1979年5月10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商务部部长朱厄妮塔·克雷普斯时指出:“我们经济调整本身,是为了使经济发展得更快,更好地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资金。还有一个要利用好的,就是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这也是我们的缺口。”^③1980年4月,中国政府批准美国沈伊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旅行社北京分社合资兴建北京长城饭店,打响了中美合营兴办企业的第一炮^④。同年4月24日,中国银行与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以及华润公司签订协议,成立全资财务公司,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7页。

②官力:《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红旗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页。

④陈继勇:《论8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特点、问题及其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11期。

营业范围以东南亚为主,遍及世界各地^①。

此时,中国已树立起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念,邓小平对吸引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予以坚决支持。1984年3月14日,他在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强调:“吸收资金,引进技术,不进一步对外开放不行。主要对象是美国、日本、西欧。对苏联,政治上坚持消除三大障碍,不松口,经济上可以解冻,多做些生意。”^②

为此,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大对重点国家招商引资的工作力度,促成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良性互动。1999年11月,中国和美国经过长达25轮的谈判,终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展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当时,中国面临世界发达国家再次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形势,如何抓住这个机遇,选择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③在此背景下,广东省委开始考虑如何能发展得更快一点的问题,并向党中央汇报。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

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④。对于出口加工区的名称,邓小平认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⑤邓小平向党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这一要求。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⑥。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法律上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1981年11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行法规,实际上也批准了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⑦。邓小平主导创建的特区由此成为中国招商引资的示范区和对外开放的急先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了验证创办特区的实践效果,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特意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3个特区和经济重镇上海。2月24日,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在同胡耀邦等同志的谈话中,全面

①顾云深、石源华、金光耀主编:《鉴往知来——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67页。

③金姬:《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试验田》,《新民周刊》2018年第16期。

④《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⑦黎青平:《毛泽东邓小平与对外开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总结了创办特区的经验,并且指明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他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①对于特区定位,他明确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②他还提出了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意见,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③他还提议“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政策,大家要考虑”^④。

邓小平对特区的视察和充分肯定,鼓舞和振奋了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扩大开放的信心和勇气。为了落实邓小平的相关指示,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决定开放由北至南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⑤。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关于全面开发海南

岛的设想也进入具体实施阶段。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正式宣布:“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⑥

经过充分的筹备和细致的建省工作,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海南由此成为我国第31个省和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极大地促进了海南岛的开发开放和经济发展,并为特区的建设积累了更多经验。

苏东剧变后,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加大,而且周边国家都在加快发展,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落后,压力就会更大。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那就是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充沛的人力资源对招商引资有足够的吸引力,特别是上海更是得天独厚,具有人才和工业基础优势。经过慎重、科学地评估,邓小平提出了开发上海浦东,振兴上海,形成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格局,以此促进全国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构想。

在此背景下,1990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1991年1月,邓小平视察上海并指出:“开发浦东,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4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①他还从国际战略的高度特别强调:“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②

正如邓小平设想的那样,开发浦东不仅成为振兴上海新的增长极,而且带动了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浦东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典范、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1992年,在开发开放浦东的基础上,中国决定再开放5个沿江城市、4个边境、沿海区省会城市及11个内陆省会城市。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及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

四、沉着应对严峻国际局势,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使中国外交走出低谷,迎来新的转机

1989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后,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我国展开全面制裁,企图以压促变,中国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面对严峻形势,邓小平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沉着应对。

1989年7月2日,他在会见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指出:“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

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③

在此之后,他提醒说:“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④

邓小平此时的思路是用软弱的态度不能稳定中美关系,有时候“硬一点”,让其碰钉子,反而会促使其“转弯子”。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此时主张对美国“硬一点”并不是要把中美关系彻底搞僵,而是促使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转弯子”。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应对外部环境急剧恶化的方略:“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⑤中国据此调整了外交方针,一方面,坚决反击美国的对华制裁,坚持美方应先主动采取措施;另一方面,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以此稳住国内局面。与此同时,积极争取愿意同中国继续打交道的力量,由此获得战略主动。

邓小平从全局战略层面提出“冷静观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367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4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320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①的战略方针,成为中国外交指导思想。

邓小平的战略主张是,在错综复杂的困难局面下,不能急躁,不能贸然行动,而应沉下心来,冷静观察和研究国际风云和大国博弈的基本走势,耐心地从中寻找突围的机会,做到谋定而后动;战略上不要锋芒毕露,不要将斗争的焦点引向自己;应韬光养晦,低调行事,不打头阵,避免成为众矢之的;要集中精力,排除干扰,继续改革开放,努力发展经济,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但在善于守拙、埋头苦干、“决不当头”的同时,“还是要有所作为”。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②在这方面,中国有能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在外交领域全面贯彻实施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战略方针,以坚韧、沉着和冷静的外交姿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坚持遵循邓小平:“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③;“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④的指示精神。与此同时,中国不受外界诱惑,决不当头,但

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顺势而为,在国际社会发挥积极作用,逐渐走出外交低谷,巩固了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由此,逐步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迎来新的转机,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重点是要量力而行。在现有的条件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解决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缺一不可,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在深刻影响中国主权、安全和重大发展利益的问题上,在关键时刻、重要议题和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能够并且必须有所作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指导着中国的外交实践,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取得突出的成效,对当代中国外交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五、结语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邓小平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和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丰富而珍贵的历史经验,这对当前处理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

第一,当代中国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于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大局。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

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②《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3页。

一个和平环境。因此,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和平^①;要在对外交往中最大限度地为中国争取经济利益,坚决维护中国经济利益;积极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国际社会树立起中国热爱和平和遵守国际规则的新形象,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为实现这一基本目标,邓小平率先垂范,并为此作出巨大努力,取得显著成效。

第二,在国际关系中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定亲疏好恶,扫清与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障碍。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决主张: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②。这样一来,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才能大大扩展,赢得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在苏东剧变后,邓小平及时提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③由此实现了中国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

第三,提出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指导原则,为党的十二大确立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提供思想理论依据。邓小平深刻总结党际关系经验教训,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

通的”^④，“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⑤。为此,他郑重提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⑥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的十二大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⑦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理论的新篇章。此后,我们党不仅加强了同其他国家共产党及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而且在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扩大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⑧。由此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拓展了同世界各国其他类型政党之间的联系,并促进了与之相关的国家间关系的发展。

第四,在处理大国关系问题上,既要守住底线、坚持原则,又要权衡利弊、保留策略上的灵活性。既要刚柔并济,注意把握斗争的时机和分寸,避免一斗到底,影响全局;又要坚持把反对霸权主义同发展大国之间的

①《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 页。

②《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 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3 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8 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8 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9 页。

⑦《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8 页。

⑧《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7 页。

正常关系严格区分开来。邓小平一再强调,要针对具体情况,根据自身的核心利益或一般性利益,作出不同的反应,该斗争时针锋相对,绝不含糊;该谈判时坦诚对话,以理服人;该合作时绝不放弃。反对霸权主义还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维护大国关系相对稳定,赢得战略主动。

第五,找出解决国际争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出路和新办法。邓小平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解决问题的出路。”^①这是他多年思考的重大问题,为此他提出:“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

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②这说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既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有效办法,同时也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出路。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这样“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③。在此基础上,他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④由此中国外交创造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模式,为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稳定世界局势提供了新的范式和启示。

(责任编辑:李国亮)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